

非洲民族主義與現代政治發展

楊 逢 泰

非洲民族主義的內涵

研究非洲的學者們（Africanist）認為政治學家的傳統概念和方法不適宜用來研究未開化社會的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活，非洲民族主義的目標雖然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可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和制度完全是西方的形式，其內涵亦是西方的。政治學家所指的族國（Nation）並不是指一個鬆弛的團體，包含着一羣部落而已；而是指業已經過部落制度和封建制度的一個現代社會。因此有少數學者如海雷勳爵（Lord Hailey）認為目前正在改變非洲的力量不應稱為民族主義，而應稱之為非洲主義（Africanism），以示其基本不同的特性。

海雷勳爵在「非洲觀察」（An African Survey）一書中強調：在歐洲，民族主義縱令不易予以定義，却是一種公認的力量。可是民族主義此一概念的許多聯想很難適用於非洲的情形……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能置於一個形式的政府下是歷史的偶發事件，他們沒有共同淵源的傳統，也沒有對政治前途共同的觀點……以一般民族而言，以「非洲主義」一詞來敘述若干國家的運動似乎更接近。

雖然如此，可是，迄目前為止，大多數研究非洲的學者們依然將目前正在改變非洲的力量稱之為民族主義，因為：

第一、柯恩（Hans Kohn）在「民族主義的性質」（The Nature of Nationalism）一文中雖然強調：民族主義是族國內全體人民所具有的一種至高無尚的團體意識的表現，族國要求人民至高無尚的忠誠，現代非洲的政

治區域是一八八五年柏林會議後，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結果，沒有依照部落生存的領域的界線，或自然的界線。所以，對大多數的非洲人而言，有隸屬意識（sense of belonging）的社會政治團體是氏族（clan）或部落。在廣大的領域中沒有可與族國相比擬的社會政治組織。

可是，研究傳統民族主義的學者勃克（Edmund Burke）提出了「層級忠誠」（Hierarchy of Loyalties）的概念。他認為：每一階層的忠誠在其範疇中是至高無尚的。整個層級忠誠的體系是傳統的，所以也完全是自然的。因此，人對家族和地區應該效忠。區域主義（regionalism）既然是傳統的，也是自然的。國家應該尊重並鼓勵此種忠誠，作為愛護一個廣泛國家的必要條件。

第二、解佛德（George W. Shepherd, Jr.）以法國十九世紀著名哲學家雷南（Ernest Renan）的民族主義概念來解釋非洲的民族主義，他認為非洲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隸屬意識」，也是種心理現象。雷南於一八八二年宣稱：組成一個族國的人民並不一定說同樣的語言，或者是屬於同一種族團體，而是在過去已完成共同偉大的事業，並有在將來完成這些事業的希望。在非洲，對過去若干古老王國的記憶往往配合着建立新國家的洶湧澎湃的力量，法屬蘇丹（Soudan）在獨立時採用了古代馬利帝國（Mali Kingdom）的國名，而黃金海岸在步入獨立國家時代之際，沿用了模糊的古迦納的國名，對過去偉大成就的記憶加強了今天迦納公民享有共同命運的意識。

第三、夏佛（Boyd C. Shafer）在「民族主義定義的商榷」（Towards a Definition of Nationalism）一文中認為：「民族主義不是一個簡潔而固定不變的概念，而是一個經常變化的若干信心和環境的綜合。」他又說：

「經二世紀來的研究，『民族主義』一詞尚無精確和為一般學者所接受的定義」。

在每一個族國、國族(nationality)和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包含着不同的歷史因素，而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地理環境亦影響了它們的發展，所以每一個民族(People)的民族主義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而且隨着時代而改變。就歐洲而言，德義兩國統一較遲；所以兩國的民族主義與英法的民族主義不同。英法兩國一水之隔，而法國因缺乏天然的河山作為屏障，所以英國的民族主義也不是法國民族主義的同義字。

所以，學者們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理由，予以民族主義不同的定義，因此我們在研究歷史、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時，應特別謹慎，不能將歐洲的民族主義來解釋當代非洲的民族主義，換言之，今天的非洲民族主義有其不同的含義。

事實上，非洲民族主義亦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非洲大陸，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高爾曼(James S. Coleman)有關非洲民族主義的定義，可以解釋這種現象，根據高爾曼，非洲民族主義不能以共同的語言、文化、歷史背景、風俗習慣，甚至共同的疆界來敘述，這是一種對正在鑄造中的共同團體——民族國家——的隸屬意識。他說：

民族主義是對一個族國或國族的隸屬意識，在情操和活動中表現欲獲得或維持該團體的福祉、繁榮和完整，以及盡量擴大其政治自治權的願望。至於表現民族主義的團體可能是一個事實上的族國或國族，或者是一個特定領土內的一個團體。其中些份子相信並主張該團體應該，或命定變成一個族國。如果表現民族主義的團體是一個既已存在的族國，則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在獲得、維持或恢復其政治獨立，在國際社會中成爲一個民族國家；如果表現民族主義的團體是一個既已存在的國族，則民族主義係指一種情操和活動，其目的在盡量擴大其政治自治權，在國際社會中成爲一個獨立國家，或者是成爲一個多族國家中的成員；如果表現民族主義的團體是一個特定領土內的團體，它既不是族國，亦不是國族，則民族主義是指一種情操和活動，其目標在建立一個族國和獲得獨立國家的地位。

族國建設：非洲民族主義和現代政治發展的共同目標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民族自決」的聲浪中結束。哈普斯堡和土耳其帝國(Hapsburg and Turkish Empires)的崩潰導致了若干民族國家的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法贏得了勝利，失去了帝國。在亞非地區突然出現了許多新國。當大國們變成了超強國時，貧富國家間的空隙却與日俱深。世界政治的焦點戲劇性的集中在那些貧弱而致力於發展的國家。在世界政治字彙中充滿了與「族國建設」(Nation-building)有關的新觀念：諸如「經濟發展計劃」、「技術援助」、「第三世界」、「不結盟」、「繁榮期待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現代化」和「知識中堅份子」(intellectual elites)等等。誠然，發展地區的「族國建設」已是二次大戰後世界政治的重點所在。

在目前的世界，似乎存在着一種「時代錯誤」(Anachronism)的現象。一方面科學進步已經到達太空探測的時代；另一方面，若干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仍在集中力量如何教導農民改進農業技術和訓練人民初步的工業技術。可是在這個最前進的廿世紀的技術奇蹟和陳舊的傳統生活習慣之間，一定有一個明確的連鎖關係。科學革命已啓示人類：人可以根據他的意志來改變他的生活情況，爲他所生活的社會建立一個新的環境。

非洲的殖民地在獲得獨立後，即進入國家時代(statehood)。新的領袖們相信，只要有計劃，一定可以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新環境，可是一個國家(state)並不一定與一個族國(nation)同時發生。獲得主權國家的地位並不同時成爲一個族國。

到目前爲止，漠南非洲的國家尚沒有一個已達到民族國家的階段。如果一個社會希望轉變爲一個現代國家，它的政治機構和實施必須適應現代國家的條件，必須揚棄傳統帝國、部落、種族社會或殖民地的政治，轉而從事於締造族國所必須的政治活動，使這個民族國家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中能作有效的活動。因此政治發展是那些祇是在形式上，和由於國際禮儀上被稱爲

民族國家的社會變成實際上是民族國家的過程。國家需要發展維持某種程度的公共秩序的努力，動員資源從事集體企業，並有效的維持國際承諾。政治發展的考驗，包括（1）建立民族國家所必須的公共機構，和（2）在政治生活中，有節制的表現民族主義的現象。也就是說，政治發展是在國家機構範疇中的民族主義的政治，可是民族主義僅是政治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條件。因此政治發展需要將分散和未經組織的民族主義的情操轉變為公民精神。同樣的，國家機構的建立亦須將民族主義的願望和公民權利轉變為國家政策和方案，簡而言之，政治發展就是族國建設。

因此，潘歐（Lucian W. Pye）說：「當代政治發展的精義在瞭解非常複雜的人類制度——現代民族國家」。目前非洲的新興國家正在經過一項蛻變的過程——從部落社會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非洲民族主義的目標——建立民族國家與現代政治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

歐非文化接觸與非洲民族主義的

興起

非洲民族主義是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觸（acculturation）的結果；也就是兩種不同文化繼續不斷的接觸後所產生的改變，就非洲而言，此一過程亦可稱之為西化（Westernization）或歐化（Europeanization）。所以非洲民族主義是自從歐洲人到達非洲後，在非洲大陸上所發生的一種深遠和複雜的結果，西方的技術、社會政治制度和思想加諸於非洲社會而劇烈的改變了非洲的舊秩序。在這個過程中，非洲人已經獲得了新的價值觀念和技術，來追求財富、地位、聲望和新的政治團體。這種西方的影響可分下列數點予以說明：

一、經濟制度的改變

殖民國家和歐洲企業爲了增加非洲物資的輸出，而將非洲自給自足的經濟轉變爲貨幣經濟。從而促成了經濟的個人主義，土地所有權的改變，資本的累積，工資勞工的成長和中產階級的興起；因而削弱了非洲傳統的社區和血統的關係。此外因工人們受到經濟剝削而生怨言，增加了民族主義者所領

導的政黨力量。

二、城市的崛起

歐洲人經營的企業以及在歐洲人統治下部落間的和平狀態，促進了社會政治的再統合（socio-political reintegration）和城市的興起，因而促成了民族的統合意識。在西方，民族統一常常是犧牲了半自治的城市；在非洲，這個過程是相反的。民族主義的推動力淵源於城市，而輻射到鄉村。

三、知識中堅份子的抬頭

西方教育不但提供土著共同的語言，而且給予知識和工具，來爭取地位、聲望和達成他們在新社會體系中的願望。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薰陶使非洲人不甘於外國的統治，知識中堅份子不但獲得了科學方法，進步的觀念和改變自己命運的決心，而且具有現代組織的能力和煽動的思想。此外由於青年人接受教育，而獲得了支配各方面的技術。財富和權力逐漸由傳統的領導階層轉移到年青的一代。而且歐洲人的統治和現代文化力量削弱了傳統的權力，作爲忠誠和依存目標的原有社會政治單位——部落——逐漸失去了意義，因此在非洲社會中產生了「福德教授（Professor Daryll Forde）所稱的「地位倒轉」（Status Reversal）的現象。

四、基督教的傳播

基督教傳教士社會所追求的歐洲化對於傳統的非洲宗教和道德制裁方式是一種正面的攻擊。基督教平等的理論和博愛觀念對帝國主義的倫理應說復構成一種挑戰。白人傳教士不能容忍某些非洲人的風俗習慣，因此引起宗教的分離運動。

五、族國象徵的鑄造

萊根姆（Colin Legum）在「泛非洲」（Pan-Africanism）一書中說：「非洲大陸不啻是一個五十六塊的益智分合圖。當代的民族主義者將這種情形歸咎於「帝國主義者有意造成的巴爾幹化」，而忽略了在殖民統治之前，非洲是一個幾百塊的益智分合圖。就西方學者的觀點看來，殖民主義縱然是

一種罪惡，但對於不同種族單位的組合有相當的貢獻，而且奠定了族國的基礎。所以，歐洲國家的統治為建立新族國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各殖民地的疆界內，社會溝通、經濟交換頻繁。此外，歐洲人介紹了行政體系、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非洲民族主義的演變

研究非洲的學者很難將非洲大陸上過去與現在的許多運動納入民族主義的範疇中。一般的說，這些運動是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經接觸後所生的反應，高爾曼將這些運動分為三種，亦顯示其演變的過程。

一、傳統主義者的運動

傳統主義者運動(Traditionalist Movement)是一種抵抗歐洲人初期的佔領和反對殖民政府高壓措施的自發性的運動。或者是非洲人受到異族統治和社會不平等後的一種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出路，林頓(Ralph Linton)稱之為土著保護主義(Nativism)。這是社會構成份子中有意識的或有組織的企圖，其目的是復興該社會的文化。

二、諸說混合運動

諸說混合運動(Syncretistic Movement)包括宗教分離主義者因不滿白人傳教士而設立的宗教團體、知識份子所領導的宗親公會(kinship association)和部落公會(tribal association)。

某些傳教士受「白種人的負擔」(whiteman's burden)，這種心理的影響，往往輕視土著的文化和傳統，非洲宗教中的精靈論(animism)和多神論(polytheism)復不容於基督教的教義。如果接受基督教，非洲人必須放棄若干傳統的信念和習慣，在許多情形下，必須拒絕部落的權威，因而信仰基督教的非洲人自行組織了獨立的宗教團體。

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在城市中所組織的宗親公會或部落公會，往往希望復興建立部落感情，以建立大規模政治單位，這種政府的形式是部落和西方制度的混合體，在某種情形下，宗親公會是民族主義組織的前身。

三、現代主義者的運動

民族主義運動是已經西化的社會中堅份子，也就是現代主義者所組織和領導的運動，他們受西方民主政治、進步、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和民族自決等觀念的鼓舞，而希望：(1)建立現代獨立的民族國家，具有國家的規模，獨立的主權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有被承認為會員國家的一切條件，或者是(2)在一個廣泛的歐非集團(Euro-African Grouping)中，或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中獲得絕對的社會平等和政治自治權。

以上這種區分是人為的。每一種運動都是受外國統治、分解力量侵入和現代性等挑釁的反應，而彼此之間有密切和一貫的關係。傳統主義者的運動是消極的，反映未曾與西方文化接觸的羣衆(unacculturated mass)一種強烈的願望，反對外來的新文化和保全舊有的文化。諸說混合主義則不然，它含有理性的因素，這是一種企圖將與新文化相容的舊文化恢復的運動，祇有民族主義運動是一種積極和急進的運動，其目的在改變權力結構。簡而言之，民族主義是反抗殖民主義的終極形式。

影響非洲民族主義的因素

在二次大戰以前，民族主義運動僅是非洲都市中少數知識份子的秘密消遣而已，二次大戰是非洲民族主義的轉捩點。大戰期間，大批非洲人參加英法的海外部隊作戰，他們在這個生死的鬥爭中實際上已與全世界各民族接觸，他們的心理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

此外，世界政治的兩極化，冷戰和聯合國建設性的角色都直接或間接的助長了非洲的民族主義，千千萬萬人獲得了自由，整個的氣氛中充滿了獨立的精神。從好望角到開羅，從阿克拉到奈羅比(Nairobi)，非洲人民呼吸着不可思議的獨立氣息。

非洲的知識中堅份子以積極的努力，在兩種不同的方式下推動民族主義的十字軍。第一種方法是經由民族主義者的報紙、獨立的非洲學校，宗親公會和部落公會等向羣衆宣揚教育、福利、進步和自治等思想。其目的，如果以阿齊克威的話來說，是從一個奴隸殖民地精神狀態中完成「精神的解放」。

(Mental Emancipation)。第二種方法是在受傳統束縛的羣衆中發掘一切現有的土著和宗教的緊張情形以及不滿的情緒和願望，將他們的力量集中起來，支持民族主義運動。

可是非洲大陸遼闊，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複雜，因此非洲的民族主義有許多形式，殊難以概括的說明。按種族的區分，非洲有三個地區：阿拉伯人、黑人的北非，黑人集中的西非和中非，多種族的東非、中非和南非。阿薩蒂(Ashanti)的復蘇部落主義，肯亞毛運動(Mau Mau)的狂熱主義，南非白人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恩克魯瑪泛非洲的超越民族主義(supranationalism)，以及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獨立的決心，都是非洲民族主義各種不同面貌的表現。這些顯著的不同，有若干解釋：

第一、非洲各地區與歐洲文化接觸的程度不同(degree of acculturation)，反映與歐洲影響力接觸期間的久暫和程度。非洲西海岸與西方接觸較早，所以英屬西非和塞內加爾(Senegal)較為進步的民族主義與英屬中非和法屬中非的初期民族主義不同。

第二、白人移民的多寡亦影響民族主義的程度。西非氣候炎熱，鳥獸毒蟲繁生，不適於歐洲人居住，當年有「白人墳墓」(whiteman's grave)之稱，所以歐洲移民很少。因此，在英屬西非，民族主義者的目標有完全實現的可能性，部份的解釋民族主義有充滿信心和樂觀的期待；而白人移民很多的肯亞，恐怖主義的傾向反映缺乏這種溫和期待的心情。

第三、殖民政策的不同構成了另一個原因。民族主義主要是英屬非洲，其次是法屬非洲的現象。就英屬非洲而言，在西非和東非均實施所謂「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在奈及利亞，英國維持傳統制度的政策亦表現在經濟政策方面——正式承認和支持土著的土產所有權方式。此一政策不僅阻止了英國的大量移民，而且阻止了人口從耕地缺少的地區如伊包蘭(Iboland)移居到人口稀少的西區和東區。因此奈及利亞境內各種族被凍結在英國人到達時他們所佔的區域內，這種政策不啻是延長區域主義和鼓勵部落主義。

英國在東非和中非也是實行間接統治，可是殖民政策受到在肯亞和羅德西亞等地大量白人移民的影響。土地政策成為白人移民和土著之間的嚴重問題。大批良好的土地讓與白人，成為「白人的保留地」(whiteman's reserves)。肯亞克古育族(Kikuyu)所發動的毛毛運動，其目的就是以

恐怖行為來迫使白人離開肯亞，以便收復他們的土地。

毛毛運動對肯亞的政治發展最重要的影響，是英國阻止全國性羣衆政黨的出現，以防止毛毛運動的蔓延。所以英國人祇准許區域性政黨的組織。

就法屬非洲而言，因為法國人的殖民政策是同化和「直接統治」(direct rule)，而產生不同的情形。自從一九四六實施改革以來，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均有議會的設立，地域性的民族主義運動曾經一度消蝕，而產生了一個泛法屬非洲的政黨——非洲民主議會(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一般而言，在法屬非洲並沒有區域性的民族主義(regional nationalism)。

民族國家的建設和「世界文化」的傳播

通常，非洲民族主義的目標有二：第一是獲得自由，第二是在準族國(nation-to-be)的疆界內建立民族團結的文化意識和政治意識。

非洲民族主義者除追求第一個目標外，不得不採納第二個目標。因為殖民國家無意在現有的疆界內建立幾個國家。例如在奈及利亞境內有三大部落：東區的伊包人(Ibo)，西區的耶魯巴人(Yoruba)和北區的浩沙——福拉尼人(Hausa Fulani)。這三大種族團體對於他們各自的部落或區域具有濃厚的隸屬意識，這就是高爾曼所稱的區域性民族主義，或部落主義。在奈及利亞的政治氣候中，出現了三個區域性的政黨。這種區域性民族主義代表着潛在的和經常的分離主義運動和國家分裂的危機。

部落主義是非洲民族主義者所指非洲社會和政治制度中阻礙現代化的各種因素，也是非洲民族主義者所遭遇的一種困難，當殖民主義撤退後，部落主義更形強烈。赫克斯勒(Elspeth Huxley)在「非洲的第一忠誠」(Africa's First Loyalty)一文中說：「殖民主義是膠水，將這些人文單位(部落)黏在一起，在地圖上成為可以識別的形式。現在膠水溶解，這些單位也分開。」

海斯(Carlton J. H. Hayes)在「民族主義——種宗教」(Nationalism - a Religion)一書中說：

在非洲幾乎是普遍的有兩種不同而互相衝突的民族主義。一種是以當代的非洲領袖如迦納的恩克魯瑪、幾內亞的杜瑞(Sékou Touré)和肯亞的姆鮑亞(Tom Mboya)等為代表。他們都在西方受過教育，他們不僅想將以前的殖民地「解放」和轉變為多少以歐洲國家為藍本的民族國家，而且壓制部落主義。他們認為部落主義是不合時代的原始野蠻民族的表現，而且是族國統一和進步的阻礙，他們歡迎現有的聯邦國家，但是他們要求的聯邦在政治上是族國而非部落的。

非洲民族主義領袖為確保自由，克服對原殖民國家的依賴性，而訴諸泛非洲團結的途徑：另一方面，在要求族國統一方面遭遇到部落主義的困難。艾默生(Rupert Emerson)曾經將非洲的民族主義比作天秤。其一端是泛非洲主義的夢想，另一端是遠溯至過去的部落主義；前者代表統一的願望，後者代表分離主義。

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如果民族主義者急欲獲得獨立，達到自治的目的；就將減少導致第二個目標——文化和政治團結的可能性。所以非洲民族主義領袖所遭遇的最大困難是如何在歐洲殖民國家所建立的人為的疆界內所居住各種族融合起來，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和文化的族國。他們的任務不僅是進行政治革命，取得政權，而且是從事一項族國政治統合的艱辛工作。

狄茲克(Professor Deutsch)提出了一項可以決定民族主義者建立民族國家努力的成敗標準，他的主要理論是：一個族國是將民族或幾個種族團體轉變的結果；成功的希望取決於此項轉變是否能完成以及社會動員的程度。奈及利亞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可是奈及利亞的分離主義就是社會動員沒有完成的一個例子，當泛奈及利亞的民族主義消失，而代之以區域性的民族主義時，奈及利亞的「族國建設」問題轉變為「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問題。

西方的影響力不僅使非洲社會的階級結構，而且使各民族價值和制度，以及社會的規模均產生了根本的改變。迄目前為止，非洲新興國家，除少數例外，均接受了殖民時代非洲人工劃分的疆界。因為新獨立國家中種族和部落的複雜，以及歐洲殖民時期的相當短暫，所以族國的統合工作變成了今天非洲社會的中心政治問題。雖然非洲現階段的社會中，種族和部落的複雜妨礙了族國統合的過程，但尚未構成這些新國家生存的障礙。一般的說，在

一特定的政治社會中，部落的數目愈多，其規模愈小，則有效統合的機會亦更佳。

在西方殖民時代中，一個最基本的主题是歐洲人要求「人羣關係」(human relations)，特別是糾紛的排解必須要根據明白而普遍接受的法律。在過去三世紀，西方與世界其他部份接觸的過程中，希望將所有的社會轉變為民族國家。西方對那些不願自動轉變為民族國家的社會，不惜用強制的方方式，即以直接援助或公開干涉的方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當年，歐洲人到印度、中國、爪哇、日本和亞洲其他各地，亦持同樣的態度：希望當地的統治者接受西方國際法的觀念的慣例，當這種間接方法無效時，不惜採取殖民主義。

現在殖民時代已經過去，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繼續以技術援助、外援等方法來援助非洲社會或者是準族國轉變為現代的民族國家，其目的之一部份亦在於此。根據潘歐，目前整個世界正進行着兩大改變：

第一是現代化：所謂「現代化」，是一個深遠的社會改變的過程，受傳統束縛的鄉村或以部落為基礎的社會在這個過程中被迫對現代工業化和以城市為中心的世界的一切壓力和要求作適當的反應。此一過程亦可稱之為西化(westernization)或簡單地稱為「前進和進步」(advancement and progress)，或更確實的稱之為所謂「世界文化的傳播」(diffusion of world culture)。這個世界文化基於進步的技術，科學的精神，對生活的理性看法，對社會關係採取現世的途徑(secular approach)，對公共事務具正義感，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領域中接受「政治的主要單位應該是民族國家」的此一信心。

第二個改變是國際關係體系歷史性的發展。而在這個國際關係的體系內，其最高單位仍然是民族國家，因此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和維持有助於現代化各種因素的傳播。可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前靜止的社會發生了緊張和不安定，從而產生了各種分裂性的力量，而威脅了由民族國家所組成的整個國際體系的不安定。

作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應該具有一種責任感，來維持國際的安定，努力加速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使所有社會轉變為安定的民族國家；同時，應該設法使這個社會改變的過程不影響國際社會的安全和進步。